

维多利亚盛世的实录

——读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札记

金 嗣 峰

从来,资产阶级历史学者,对十九世纪美国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1837—1901)的繁荣昌盛是赞不绝口的。

但是,必须指出,这个“繁荣”是建立在极其残酷的剥削基础上的。当时的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对外进行疯狂的掠夺,对内实行超经济的压榨,使得中小资产阶级分化趋势,日益加剧,广大劳动人民生活严重恶化。对于这一切,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从来讳莫如深。

被恩格斯誉为“时代旗帜”的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凭着正直的艺术家应有的勇敢,通过长篇小说《大卫·科波菲尔》,挑开了维多利亚盛世的纱幕,揭示了大英帝国“繁荣”的真相。

狄更斯一生著述甚多,就思想性和艺术性全面衡量,《大卫·科波菲尔》应属上乘之作。作者也表示他最喜爱《大卫·科波菲尔》。这原因,我想不尽是作品主人公的命运,包含有作者自己的影子。

《大卫·科波菲尔》的情节并不复杂,但作者通过大卫·科波菲尔一生的经历,所串连起来的社会画面却是极其广阔的。在这幅广阔的画面里,充满了令人沮丧的、异常凄婉的人物和情节。这样,伪饰的假象得到了揭露,隐蔽的真实得到了反映,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乐观信念得到了动摇。这不仅是作者喜爱这部小说的一个原因,而且也是这部小说的主要价值所在。

爱情和婚姻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最喜爱

的主题之一。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欧洲社会生活中的爱情与婚姻,失去了早年所具有的异性间爱悦的诗情画意,与反封建专制的历史进步意义。

金钱粗暴地闯入了这所人类心灵中最圣洁的殿堂,爱情和婚姻转化成了一种商品。人们优先考虑的,不是对方的才貌与人品,而是叮咛作响的金磅。

狄更斯对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爱情和婚姻问题是比较注意的。在著名的《董贝父子》、《艰难时世》等小说里,作者就反映过金钱如何摧残着人的最后一点人性要求,终于酿成了无可挽回的悲剧。

在《大卫·科波菲尔》中,作者对这个问题,有更多的观察与思考,用大量篇幅,多侧面地予以反映。

小爱弥丽是一个工人的女儿,她年青、美丽、善良,对资本主义罪恶渊藪天真得近乎无知。为了报答舅舅的抚养之恩,帮助舅舅摆脱穷困,她向往成为一个“阔太太”。比起另一些因爱慕虚荣而失足的贫家少女来,她的动机和后果,更能赢得人们的同情。

我们知道,贫家少女与资产者“恋爱”,后来又遭遗弃,这个被恩格斯称之为“老而又老的故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几乎每日都在发生。爱弥丽在僻远的滨海地区长大,对此毫无警惕;但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即使一个比她成熟十倍的女子,也无法逃脱金钱的罗网。在富家子弟斯提福兹的勾引下,她撕毁了和海穆的婚约,私奔了。

爱弥丽错用了千百年来妇女反抗封建包办婚姻时的有效手段，结局是可以预计的。她没有成为“阔太太”，而是成了一个纨绔子弟的“情妇”。几年之后，她被遗弃了，象一个厌腻了的玩具，被赏赐给了仆人。她微倖逃出火坑，但为生活所迫，又几乎沦为妓女。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被遗弃的贫家少女，她们的出路是非常狭窄的，或者进一步沦落，或者自尽。仅仅由于作者的善良，才将她送往澳大利亚去过“新生活”。这个结局，虽然减轻了这个少女遭遇的悲剧性，却多多少少违反了生活的真实性。

大卫母亲的爱情和婚姻悲剧，是另一类类型的。丈夫死后，她守着一个遗腹子和一个忠心于她的女仆，生活过得很是满不错的。但是，一个陌生男人撞进了她恬静而又幸福的生活。她爱上了他。一个“美丽的小寡妇”爱上了一个“英俊的”先生，这是非常合乎常情的。但是不幸的是，这位摩德斯通先生（一个小酒厂的合股人）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积累财富上。他把这次婚姻，仅仅看成是有利可图的“生意”。这位“迷人的”科波菲尔太太从前夫那儿继承来的一幢舒适的楼房，一座幽美的小花园，以及一笔为数相当可观的年金，才是勾动摩德斯通先生魂魄的原因。果然，一经结婚，立即将姐姐珍·摩德斯通接来，强行掌管家产。随后，又想方设法从精神到肉体折磨大卫的母亲，使得意志脆弱的她早早地离开了人间。

摩德斯通先生以婚姻为手段，来积累财富的目的，顺利地达到了。不几年之后，他就和另一个“很有钱，也很漂亮”的少女结了婚，如法炮制，再一次得遂了意愿。在小说快结束的时候，他又结婚了，仍是“一个具有相当财产的年青的小姐”。

摩德斯通先生这种行为，也许已经超出了资本主义金钱关系的范围。但是，他这种做法并不一定比美国资产阶级发家过程中，

贩卖黑奴、贩卖鸦片等行径更卑鄙、更恶劣。因此，摩德斯通先生才得以畅行无阻，没有激起社会应有的义愤。这才是触及了问题的实质。

假若这种行径终究过于丑恶，较为罕见的話，那么，马戛太太的做法，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倒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马戛太太将自己一个年仅二十的美丽的女儿安妮，“嫁”给了她丈夫的同事史特朗博士。她知道史特朗博士是一个年龄比自己还大出许多的老翁，但因为他又“有钱又厚道”，所以，她极力促成这一对不相称的婚姻。坑了女儿可肥了自己。被作者讽刺地称为“老兵”的马戛太太，不仅本人对老博士索求无己，而且还经常发挥“统率大批亲属来征讨博士的才干”。在一切都看成是商品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把美丽的女儿，当作奇货可居的商品，高价而沽，这是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马戛太太的做法，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把婚姻当作买卖的一个典型事例而已。

十九世纪中叶，美国社会生活中的爱情与婚姻问题，变化如此之大，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美国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很不彻底的国家，所谓“光荣革命”，实际上是大资产阶级对土地贵族妥协的产物。长期以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维持着以温情脉脉为特征的封建传统程式。但是，随着一八三七年选举法的改革，资产阶级巩固了政治领域中的优势，金钱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作用，日益突现。这样，封建的婚姻观念，也理所当然地为资本主义金钱关系所取代。

封建婚姻虽然也否定人的尊严，建立在权势与门第的基础上，但它终究还有羁縻双方的封建义务观念的一面，比较起来，显得较为蕴藉，不仅为封建统治阶级所需要，也为小市民所接受。于是，封建的婚姻方式，便在大家的心目中成了模式。正如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一书中所讽刺的：“末了，他们子

孙满堂，白首到老，所有的小说，都是这样结束的。”

金钱具有如此巨大魔力，以致不久以前，一谈到金钱，还认为是对婚姻衰渎的小市民们，这时候，也情不自禁地追逐起金钱婚姻所带来的相应的物质利益。

这种愈来愈粗鄙丑恶的金钱婚姻，使人们的道德沦丧到了惊人的程度。正如恩格斯论述的：——在这样情况下，婚姻不过成了受到法律承认的卖淫。较多的是女方卖淫……但也有男方卖淫。

狄更斯在小说的爱情和婚姻的主题中，给我们形象地印证了这一真理。

不过，更可贵的是，狄更斯在小说中，自觉不自觉地揭示了当时美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是以劳动人民的普遍贫困化和中小资产阶级的日益加剧的分化为前提的。

狄更斯是怀着真诚的同情来看待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他们生性忠厚、善良、正直、热爱劳动，富于同情心，但由于种种意想不到的原因（归根结蒂是资本主义经济法则在起作用），生活却愈来愈艰难竭蹶。他们之中有的人，处境是非常悲惨的，连少有所养，老有所终这样一个起码的生活要求，也无法达到。他们终年在债主和经济法庭的双重阴影的重压下，喘不过气来。

萨伦学校的教师麦尔，担负着全校教学与生活管理的工作，繁重的劳务，累得他直不起腰。但是，他仍然穷得连“半个先令也没有”。他衣着褴褛，一双皮鞋破烂到皮匠也拒绝修补。由于实在无力赡养老母，只好将她送进被认为与乞丐相去无几的“济贫院”。

密考伯先生一生都在和贫困作斗争。他负债累累，全部家产典当以尽，耳畔经常响起债主们粗暴的辱骂声。他的妻子坚信他“具有各种资格和才能”，热切地等待着发迹“机会”的来临，但是，末了，他等来的却是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而不是使他可以发迹的“机会”。

老船工辟果提的善良和同情心真是无边无际的。他收养了一个故友的寡妻右米治太太，以及孤儿海穆和无父无母的外甥女儿爱弥丽。虽然生活清贫，但日子过得倒也十分融洽。但这个融洽的家庭生活，不久却因爱弥丽受一个富家子弟勾引遭到破坏。海穆身心交瘁地在一次风暴中死了，老辟果提也弃家出走了。一个好端端的劳动者的家庭就这样毁了。看起来，这个家庭的遭遇，完全是一个偶然性事故引起的，与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人民的贫困化没有关系。但是，假若老辟果提不是过着非常清贫的生活，假若小爱弥丽不是为了想帮助舅舅摆脱穷困，那么，这个悲剧也无从酿成了。

狄更斯如实地，并且细致地叙述这些劳动者家庭事变的经过和恶化的趋势，这无疑是他高出一些同时代作家的重要原因。

但我们也应看到，作者在描述他们不幸遭遇的时候，所同情的、所称颂的、主要是他们天性中忍让、乐天知命的一面；蕴藏在劳动人民身上的反抗的一面，却丝毫没有得到反映（当时美国宪章运动的第三次高潮，刚刚过去）。在狄更斯的小说中，他们虽迭遭厄运，却连一句怨言也没有。他们的性格，至少是不积极的。这些形象所体现的思想意义，也因此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影响。

这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劳动者们的命运，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很难得到真正改善。这一点狄更斯和我们一样清楚，也许是他太仁慈了，不愿他笔下的可爱的劳动者们，都以悲剧结束。于是，将他们全部送到英国的殖民地澳大利亚去发迹：辟果提舅舅一家劳动致富了，穷愁潦倒的麦尔先生当了师范学校的校长，密考伯先生终于等来了大展鸿图的“机会”，成了“区知事”。

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哪里会有这样一块劳动者的乐土？在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阶级划分，就会有压迫和剥削。这是历史的必然。或者受压迫受剥削，或者压迫剥

削别人，传说中的世外桃源，终究只是诗人的善良愿望，在现实社会中是无从寻访的。

威克菲尔先生与贝西小姐是具有另一种意义的一组形象。

威克菲尔先生是一个著名的律师，但由于中年丧偶，情志颓唐，经常借酒浇愁，使业务不断出现差错，信誉日益下降（贝西小姐就曾公开表示对他不再信任了）。最后，因经济严重亏损，被迫同意希普成为事务所的合伙人。这样，威克菲尔先生就从中产阶级上跌落下来，成了半破产的人了。

大卫的姨婆贝西小姐，貌似粗暴，实则是一个很宽容的人。她收留患精神病的狄克先生与一文莫名的大卫，并让他受尽可能完善的教育。但是这个富裕的债利生活者，在一次金融投机中破产了。

这些有德行的资产者，自甘淡泊，与世无争，但他们不幸都陷入了有强烈个人野心的希普的阴谋罗网中，几乎倾家荡产。后来经过好人的协助，希普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他们追回了原有的财富，重又过上了富裕的日子。

在我们看来，威克菲尔先生与贝西小姐的破产，看似偶然，实乃必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中小资产阶级分化的日益加剧，导致中小资产阶级的大量破产。不管这种破产带有多大的偶然性，通过什么形式表现出来，都多少反映了这一社会的矛盾本质。

狄更斯注意到威克菲尔先生和贝西小姐的破产与半破产（其实还可以加上朵拉小姐的父亲、法律公证人斯本罗先生），这表明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清醒认识（后来让他们都重振家业，就缺乏真实感了），因为，在中小资产阶级化分的过程中，能爬上去的终究是极少数。

资本主义社会里青年人的命运，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非常注意的问题之一。

这个时期的青年，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在封建社会里，一个人一旦呱呱坠地，

他的地位、身份、财富等等便已定规，除了少数例外，一般不会变化。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的结构和成份，处于经常变动之中。发迹与破产的频繁交替出现，使得人们对门第、等级的追求，就为个人的奋斗精神、钻营能力以及欺诈作风所代替。

这种趋势愈到后来，即自由资本主义愈向垄断的资本主义过渡，青年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竞争，也愈激烈。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笔下的青年人的形象，例如斯丹达尔的《红与黑》中的于连，莫泊桑的《俊友》中的杜洛阿，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在本书中，狄更斯描写了许多青年人的爱爱仇仇，不少情节和场面，还写得十分深刻动人、催人泪下。但是，其中最值得研究的是作者对希普和大卫等三个人的命运的描写了。

希普是一个教堂看守人的儿子，论社会地位，应属于下层的小资产阶级。他从小就有强烈的不安于位的意识，他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依靠刻苦的自学，遍读了法学名著。但是，希普的社会地位太低了，为了达到往上爬的目的，就得把自己伪装起来，强使自己成为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以麻痹他主人的警觉心。

在开始的时候，他的谦卑也许仅仅是出于防护自己的本能。当时，威克菲尔先生刚刚收留他，他以一个学徒的身份，在事务所里抄抄写写。对失业的恐惧（这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使得他不能不对一切表示谦卑。

野心总是随着地位的改变而膨胀的。当希普慢慢地熟悉了业务，而且慢慢地发现了他的主人威克菲尔先生，对事务所的业务，不象往日那样关注的时候，更可能是，当他一次二次无意中发现，威克菲尔先生醉酒后处理业务，常常会出现不能容许的轻率和疏忽的时候，一个罪恶的计划在慢慢形成。希普有意识地寻找时机，导致和扩大这种轻率

和疏忽。终于，有朝一日威克菲尔先生发现自己的经济账目混乱不堪，造成严重的经济亏损，只好被迫同意希普成为事务所的合伙人。

这时希普的野心进一步发展了。他想彻底排斥威克菲尔先生，成为事务所的独资经办人，还企图迫使威克菲尔先生同意将美丽而又贤惠的女儿嫁他为妻。

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已危及到威克菲尔先生的生活和精神的最后支点，势必会引起他猛烈的反抗。所以，经过精心的策划，一个更歹毒的阴谋形成了。希普威胁利诱雇员密考伯先生，制造假单据，诬陷威克菲尔先生私自挪用业主的资金。这是非常厉害的一着，不是由于一个偶然的因素，威克菲尔先生只好坐以待毙了。

希普是精明的，性格也很强悍。他认定一个目标后，便始终不渝地去追逐它。他很可能成功，但由于他不够机智，当事情发生逆转的时候，不会及时收缩目标，因而一败涂地。

希普的这种以伪善为手段，处心积虑地准备吞噬弱者的做法，在中小资产阶级层里，是一种相当典型的现象。他们表现手法不一，但目的都不外对财富与权势的追求。

希普无疑是一个典型，但这个形象的典型性却远不及于连。这倒不是由于狄更斯仅只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常见的下属对上峰的背叛，而是因为他处理这个题材时，把叛逆的希普写得这样丑陋，把威克菲尔却写得这样方正和善良，因而所谓叛逆的社会意义就消失了，剩下的仅是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诱人堕落这样一点点意味了。而《红与黑》中的于连的叛逆，却与当时反封建专制复辟，反天主教伪善这一重大主题联系起来，因此，给人以沉郁、深刻的感觉。

在狄更斯看来，希普在个人奋斗的道路上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希普在开始行动时，就怀有犯罪的动机。假若一个人具有纯正的

理想，坚强的意志，以及不懈的努力，那么，即使是在最恶劣的环境里，也会达到他欲望的最高峰。

至于大卫，他的坚持不懈的积极向上精神，在任何逆境中努力奋斗决不消极悲观的坚强意志，更是狄更斯所击节赞赏的。

大卫在少年时所受的各种凌辱和磨难，并没有窒息他美好的心灵，他象大石下的小草，曲折地但是顽强地生长起来。刚进入斯特朗博士主持的学校学习时，由于学业荒疏，几乎被排在全校最后一名，但他以极大毅力，在不长的时间里，赶上和超过全体同学，成了斯特朗博士的得意弟子。进伦敦博士院学习时，姨婆破产了，他平静地接受这一巨变，拼命地学习，起早贪黑，一天完成几天的学习量。他的这种拼命精神，连他的老同学特拉德尔看了也大为敬佩。他就是依靠这种自强不息，力争上游的精神，慢慢地获得成就，终于成了一个著名作家，幸福地登上人生欲望的顶峰。

我们可以看出，狄更斯这样看待资本主义社会里，中小资产阶级青年问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

在狄更斯生活的社会里，由于垄断的逐步形成，竞争的日益加剧，中小资产阶级分子想要侧身上流社会，依靠个人的才能是不够的，更多的是依靠个人的狡诈和钻营。就这一点来说，希普倒是可能获得成功，而特拉德尔和大卫却是应该得到远比现在结局恶劣的下场。但是由于作者世界观的局限，对人物命运作了目前这样的安排，形成了与社会发展的总的趋势不尽相符的状况。

其次，一个作家在处理中小资产阶级分子个人奋斗这一主题时，若不与当时社会矛盾、社会斗争相联系，而是津津有味地描写他的主人公如何功成名遂，这做法本身就把自己降到资产阶级庸俗作家一流中去了。

(下转第61页)



卷九,第11—14页,卷一,第3、4页。

- ③ 《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三辑,第439页
- ⑤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三册,第157页。
- ⑧ 《黄兴复黎元洪电》,《黎元洪来往函电存稿》。
- ⑨⑩⑮ 薛民见:《黎元洪年谱资料》,1961年油印本,第44、23页。
- ⑪ 黎劭平:《宋卿先生与北洋军阀》,《辛亥首义史迹》第27页。
- ⑫ 黎绍芬:《黎元洪事略》,《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第134页。
- ⑬ 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京华印书馆版,卷二,第20页。
- ⑭ 《贾仲明挽黎元洪联》。
- ⑮ 《黎元洪主张先行度督裁兵然后就职电》,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第12页。
- ⑯ 《黎元洪复洛阳吴巡阅使电》(1922年11月25日)。
- ⑰ 《黎元洪临终遗嘱》,藏天津市政协文史组。
- ⑱⑲ 据保存完整的黎家田地房契副本统计。
- ⑳ 据有关资料综合统计。
- ㉑ 《三品顶带尽先补用都司黎元洪履历清单》,《故宫档案》,兵部武选0020(7)号。
- ㉒④⑬⑭ 《辛亥革命资料》,第494,566,563,499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
- ㉓⑤⑥ 章太炎:《大总统黎公碑》,《章太炎政论选集》下,第844页。
- ㉔ 贡少芹:《黎黄陂轶事》,第8页,国华书局民国五年版。
- ㉕②④⑤⑥⑦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10,45,149,134,45,61页。
- ㉖ 《徐寿林事略》,《湖北革命实录馆资料》Ⅱ,第107号,藏湖北省博物馆。
- ㉗ 《湘汉百事》,新中国图书局民国元年编印。
- ㉘⑫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66、274页。
- ㉙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7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版。
- ㉚ 《甘绩熙自述》,民国二年版。
- ㉛ 剑农:《武汉革命始末记》,《民国报》黄帝纪元4609年10月1日第1号。
- ㉜ 胡焕宗:《楚产一隅录》,第20页,乾记印书馆1920年版。
- ㉝ 黎重光(元洪长子)给肖致治信(1981年1月17日)。
- ㉞ 《列宁选集》第4卷,第55页。
- ㉟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四辑,第3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 ㊱⑭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75页。
- ㊲ 《武昌都督黎元洪之历史》,《湖北革命实录长编》第一册。
- ㊳ 《武汉战纪》(黎元洪主持编辑),《辛亥革命丛刊》,第三辑。
- ㊴ 居正日记,转见沈云龙:《黎元洪评传》第31页。

(上接第96页)

狄更斯是十九世纪美国伟大的资产阶级作家,《大卫·科波菲尔》是一部有杰出成就的批判现实主义代表作品。但由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前后,英国工人运动的不积极状况,以及英国中产阶级的保守倾向,这些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使得狄更斯在他的作品中出现了尖锐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一个伟大的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一方面是一个沾沾自喜的庸俗的资产者。这两方面的结合,就形成了本书思想倾向上的基本矛盾:一方面他勇

敢地挑开维多利亚女王盛世的纱幕,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在这个所谓盛世里,到处都充满黑暗、腐朽、荒淫和残暴。但另一方面,却又坚信资本主义社会的永世长存,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里仍可能实现善恶有报。善良的人虽经许多磨难,最终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和爱戴。

当然,这一切在本书中是第二位的東西,只要我们善于学习,完全不妨碍我们对这部伟大作品的阅读与欣赏、并从中汲取有用的东西。